



科举成就撑起梅州辉煌人文

谢永昌 古清华 刘奕宏

“五岭东趋尽揭阳，中有梅花乡，横枝独傲冰雪里，畸人节士代相望……”这是96年前，著名学者、曾任中山大学教授的梅州人古直用手中的如椽大笔，写下意象瑰丽的歌词，描绘位于粤东北的秀美家乡、人文秀区梅州。

耕读传家，千百年来，梅州的客家人紧紧抓住文化教育的命运之绳。从宋代以来，朗朗书声遍传于闾巷，教化流布于旷野。书院、私塾，是每个城区、村落最显眼和崇高的建筑。明清以降，梅州文教发达，逐渐在粤闽赣客家地区脱颖而出，成为地区文化的中心，成为人才之渊薮。其中重要标志就是，科举人才在清代出现喷涌的现象，与广州番禺、佛山南海形成鼎足之势。乾嘉期间更创造乡试连续“五科五解”的奇迹，即连续五科乡试，全省的第一名均由梅州士子夺得。

进士是科举制度的象征

科举制度是隋以后历代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它始于隋文帝开皇七年(587)，迄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历1300多年之久。

历代科举考试，均由朝廷制定若干科目作为取士之标准。从唐代至宋神宗熙宁之前，考试科目以诗赋为主，是为“诗赋取士时代”；熙宁至元末以经义为主，是为“经义取士时代”；明初直至清末，改用八股文，是为“八股取士时代”。

清代科举考试主要有三级：最低一级为“院试”；第二级为“乡





试”，最高级是“会试”和“殿试”。

院试之前需要经过“县试”和“府试”。凡县试、府试、院试考取第一名者称为“案首”。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为“童生试”，应考者无论年龄老幼均称“童生”。县试、府试分别由知县、知府主持。县试录取后即取得参加府试资格(雍正十一年嘉应直隶州设立以前，今梅州所属兴宁、五华县童生要到所属的惠州府参加府试，梅县、平远、蕉岭童生要到所属的潮州府参加府试。嘉应直隶州设立后，所辖各县童生在州府参加考试，府试即为州试所代替)。院试，是府(州)试录取的童生，参加由省学政(学台)主持的考试。录取者即为“生员”，或称“入学”、“入庠”、“入泮”、“茂才”，通称“秀才”，又称“相公”。

秀才经过岁、科两试，考得一等前列者便成为“廪生”。廪生属资历较深的生员，每月可得到政府的廪膳补助，还有资格做官。秀才是属于本府、州、县学的生员，若考选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则称为“贡生”，意为将人才贡献给皇帝。贡生包括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称为“五贡”。五贡都算正途出身资格，与廪生一样，可出任地方官或学官。

乡试，每三年一次，在省城和京城举行。秀才等通过“科考”合格者，方可参加。乡试由皇帝任命的“主考”主持，考期在秋天，故称“秋闱”。考取者为“举人”，又称“孝廉”。第一名为“解元”，前五名为“经魁”，余为“文魁”。各省取中举人，朝廷规定了名额。清代广东乡试每科应考者达万余人，取额80名左右。如遇皇帝即位、寿诞或皇室的庆典，可加考恩科。中了举人可入仕做官，故人们称之为“老爷”。

会试，每三年一次，在北京举行，由礼部主持。考期在乡试次年的三月，故又称“春闱”。各省举人皆可应考，考中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第2至18名称“会魁”。每次会试万余人，全榜中额约360名，广东得额(满额)仅16名。

殿试，是由皇帝在殿廷上对贡士亲发策问的考试，故又称“廷试”。殿试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亦称“殿元”、“鼎元”或“殿撰”；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三甲分别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第二甲第一名称“传胪”。一甲三名在殿试后，立即授官。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



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进士一般需再经过一次“朝考”(由皇帝特派大臣阅卷的殿廷复试),最优者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其余为主事、知县等职。清代翰林院为储才之地,主管编修国史(故翰林亦有“太史”之称),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撰拟机要文书,进讲经史等。翰林院以大学士为掌院学士,其下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官。殿试朝考后,新进士之授翰林院庶吉士者,称为“点翰林”。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官制度,科举为隋朝以后的封建王朝各阶层人士,尤其是下层寒士提供了一条入仕之路,选拔产生了11万多名进士和上百万名的举人。这些进士、举人构成了中国一千多年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主体,对隋唐以后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中国传统教育的因革等,都与这些进士、举人密不可分。他们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值得传颂。

梅州科举成就冠岭南

一个地方文化发达与否,学风兴盛与否,都可以从其地士子功名之多少看出来。梅州文教自宋以来,是较为发达的,它的开发,后于广、惠、潮三州,而发展速度却为全省之冠。

以梅县(含梅江区)为例,早在宋代就出了不少进士,有些还是一家多人的。如古成之与古宗悦为父子,古宗悦与古革为公孙,古革、古董、古巩兄弟同科进士,可谓四代五进士。蔡若霖与蔡定夫为父子,与蔡蒙古为公孙,是为公孙三进士。由此可窥当时梅州文风之一斑。明代饶相、饶与龄父子进士,张文宝、张纲父子进士;清代李象元与子李端、孙李逢亨,不仅公孙三进士,且为公孙三翰林;大埔杨之徐与杨纘绪、杨演时、杨黼时是父子进士,且三子俱为翰林。其他父子、兄弟进士,无法在此一一备述。

自宋至清末,仅梅县就考中举人681人(其中清代有623人)。在举人考试中名列第一的解元,就有李士淳、叶著、陈鹦荐、杨时行、梁念祖、宋湘、叶钧、李汝谦、李载熙等17人。考取的进士有112人(仅清代就有90





人)，其中翰林有李士淳、李象元、陈鸛荐、邱玖华、宋湘、王利亨、李仲昭、李黼平、黄仲容、李载熙、温仲和等19人。清乾隆、嘉庆年间，可说是梅州文风最盛之时。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恩科会试，广东全省中进士者仅11名，而梅县却占了5名；嘉庆三年(1798)戊午科广东乡试，全省中举者88名，梅县占17名，其中李汝谦为名列榜首的解元。

更为突出的是乾嘉年间连续五科乡试的解元都是梅州人，他们分别是梅县梁念祖(1789)、梅县宋湘(1792)、梅县叶钧(1794)、大埔丘作霖(1795)、梅县李汝谦(1798)，文风之盛，令省人刮目相看。

如此辉煌的科举成就，可从梅州的历史渊源和自然、社会环境中找到缘由。梅州客家先民从中原迁徙到这里定居后，垦殖最为贫瘠的土地，谋生极为不易。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方渐知梅州，尝谓：梅人无植产，特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方渐是福建莆田县人，进士出身，于宋高宗绍兴间来梅任州官。可见早在宋代，梅州人就喜欢读书，且因“无植产”，靠读书而谋生，这种风气一直流传下来。《乾隆嘉应州志》亦有记载：“士喜读书，多舌耕，虽穷困至老，不肯辍业。”俗称不识字为“瞎眼”，故激励人们都想读书。梅州科举最末一科进士杨沅著的《梅谚汇笺》里有一首极为流行的儿歌：“蟾蜍罗，咯咯咯，唔读书，冇老婆。”人们认为不读书是没有出息的。连贫家寡妇，也千辛万苦，积资供儿女读书。

北宋梅州知州滕元发创立州学，开培育人才风气之先。后刘安世谪居梅州，创书院教育人才，即后世所称的元城书院。学宫、书院的次第创立，为文教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宋元鼎革殆至元末战火，百年之间，梅州两经政治上之重大动荡，城野萧条，人口锐减，梅州学风陷入不振，故科举人才一度凋零。

明永乐元年(1403)，福建晋江籍举人郑懋中担任程乡知县，他为振兴教育而创设学校，并亲为学生授课，于是梅州文教始有所恢复。十年后县人罗惟政登进士第。

成化十七年(1481)，知县刘彬看到宋代刘安世所设元城书院及州官刘焕所设小学因年久乱多而倾废，便重建东、西、南、北四社学，并在城东周溪设立“周溪书院”。明嘉靖元年(1522)，广东督学魏校命程乡县训导

梅
州
井
士
水



张贤拆毁城乡各处淫祠，改设社学，并扩充田产以裕学资，自此梅州文教渐兴盛。明天启元年(1621)，知县林欲昂(福建晋江举人)在梅城下市新码头创办“锦江书院”。崇祯年间，松口乡绅李椅捐资创办“松江书院”。

经明清鼎革之乱后，清顺治十年(1653)，李士淳在城东攀桂坊(今梅城下市)设立“先贤书院”。康熙年间，县令曹延懿(大仓州人，进士)及本地翰林李象元、陈鸢荐等热心地方教育，增设书院和“义学”，于是文风又渐振兴。

雍正十一年(1733)程乡县升格为直隶嘉应州。首任州官王元枢(山东济宁人，贡生)，在城里设立“程江书院”。乾隆十五年(1750)，知州王之正(北京通州举人)将程江书院重修扩建后改名为“培风书院”(其旧址在今周增路)，成为梅城最有名气的三间书院之一。其余二间为乾隆十一年(1746)政绩卓越的州官王者辅(安徽天长县人，廪生)所建的“东山书院”(今东山中学前身)和本地举人黄鸾藻(黄遵宪之叔父)、张麟宝等人呈请州衙拨款及州属各县捐款所建立“崇实书院”(今梅州中学前身)。以上这些书院，为本地培养了大批人才。清状元吴鸿乾隆二十二年督学广东，在踏遍南粤大地后，盛赞梅州“人文为岭南冠”。

梅州进士统计与学理分析

梅州作为客家人最大的聚居地之一，科举时代考中进士的人数，目前梅州全市合计有正榜进士247名。与整个科举时代产生的11万多名进士相比，似是沧海一粟，但梅州历史上的进士逾80%集中在清代，超过200人，占清代进士总数26800多人的百分之一。从人口到地域的占比率看，梅州科举兴盛的人文景观，是值得后人自豪和学习的。

对于梅州科举时代进士多数集中在清代的现象，我们在搜集整理进士材料的过程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主要原因是与客家民系从形成到成熟的时间脉络密切相关。

客家民系从两宋形成到明末清初成熟的发展过程中，梅州起初为南方荒蛮之地，历史上动乱频繁。主要有北宋时期武装贩卖私盐的“盐寇”，南宋中后期的“峒寇”、“虔寇”，元明间的“畚寇”等，几个世纪里，





大小动乱持续不断，对地方社会造成深远影响。明中期为此专门设立南赣巡抚，统辖闽粤湘赣四省军队，对动乱进行弹压。梅州地处寇乱之地，动乱直接影响社会稳定，致使人文不振。两宋元明时代，梅州登科举功名稀少，与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客家人最大的特质是崇文重教。梅州文教兴盛，随着明代中后期民系的成熟而驶入发展快车道。据不完全统计，至清末废科举前，梅州有书院24所、义学14所、社学20所、官学4所，私塾遍及城乡。产生过文举人1230人、文进士224人、翰林33人。

清代以来，梅州文教事业的发展兴盛有三个标志。

第一个标志是清顺治十年(1653)广东学政在梅州开科取士。考场设在兴宁学宫明伦堂，调集潮州府管辖的程乡(梅县)、平远、镇平(蕉岭)和惠州府管辖的兴宁、长乐(五华)、龙川、永安(紫金)、和平、连平、长宁(新丰)等县(都是纯客县)的生童到这里参试。在非州非府的地方开岁、科取士，各地并不多见。

第二个标志是雍正十一年(1733)程乡(梅县)升格为直隶嘉应州。嘉应州由广东省布政司直管，从潮州府分出平远、镇平二县，从惠州府分出兴宁、长乐二县，由嘉应州统辖。

为什么要设直隶嘉应州？时任广东总督的鄂弥达在奏疏中说得明白：该县“文风极盛”，每次乡试、会试得中的人数都是全省最多的，别的地方“罕出其右”；由于读书赶考的人实在太多了，生员录取名额虽已按县级最高标准增至15名，仍显得“殊未相称”，有些“童子”到老都考不上秀才，因此应将该县升为直隶州，在科考方面给予府级待遇，“以光文治”。朝廷准奏升格嘉应州后，仅州学生员名额增至20名(不含附州各县名额)，所辖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的学额也都有所增加，科岁考试在州里举行，省学政直接到这里来主考。科考方面确实享受到了府级待遇。从此梅州文风更盛，每次开科，来参加考试的童生都在万人以上，读书人占总人口比例之高，可以想见。

第三个标志是乾隆十五年(1750)嘉应知州王之正在州城署前街照墙题写“人文秀区”四字，点明当时嘉应五属人文鼎盛的情景。如梅县李象元，“公孙三翰院”，乾隆壬辰恩科(1752)“同科五进士”(李江、曾凤翔、温伯魁、曾殿川、李逢雍)、广东“五科五连解”更让梅州地方声名远

播。

隶属于潮州府的大埔县，文风之盛在潮州九属中首屈一指。康熙二十七年(1688)戊辰科进士杨之徐，其三子杨纘绪、杨黼时、杨演时，分别在康熙六十年(1721)辛丑科、乾隆元年(1736)丙辰科、乾隆十年(1745)乙丑科中进士并选为翰林。与杨演时同科中进士的还有杨成梧、杨文振、陈可奇，杨纘烈则中明通榜进士，“同科五进士”。乾隆二十六年(1761)广东学政据府试情况，将潮州府学25名额分拨各县，并作定例，结果“统阅九县文卷，佳构之多，大埔称最”，将其中11名学额拨给大埔。又按“人文最盛”的标准，学额增加15名，全县就有26名生员录取名额了。大埔“一腹三翰院”与“同科五进士”两大盛事，与嘉应五属相提并论，并驾齐驱。

综上所述，梅州科举在清代考取进士呈现爆发状态，就顺理成章了。



摄影:朱迪光



梅州院士广场 石榴杆

石榴杆是以前客家人为铭记家族中考取了功名的人而立。竖在祖屋或祠堂前，以光门楣，激励来者。通常是竖立的圆锥状石柱，一般有三至四节，第一节为一支石笔，第二节柱体一般雕刻有“双龙盘柱”、“鱼跃龙门”等吉祥图案，第三、第四节则用两块石头固定，石上刻有“某人，某年，某科，中试第几名进士(或加官衔)”等铭文。